

出版论稿

巢峰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上海辞书出版社

目 录

出版理论

出版物的特殊性

——出版经济学绪论/ 2

图书是一种完全的商品/ 14

市场经济与出版改革

——兼答寒星、陶同同志/ 19

出版物的价值构成 / 24

出版经营哲学/ 37

图书效益论 / 47

图书市场竞争论/ 57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图书生产/ 78

中国图书出版业的滞胀现象是周期性必然性生产过剩危机吗? / 86

出版组织学初探/ 90

出版改革

克服出版改革中的二律背反现象/ 106

目 录

- 出版改革的大趋势 / 109
- 出版改革的再思考
——在第十届全国出版研讨会上的讲话 / 120
- 出版改革与“造大船” / 128
- 新的产业革命与出版 / 136

出 版 评 论

- 编辑要把政治关
——在编辑培训班上的讲话 / 146
- 防止图书总体质量的滑坡 / 152
- 论出版恶性剪刀差 / 155
- 刹一刹“无错不成书”的歪风 / 159
- 重视长期出书计划 / 163
- 22 年长远选题计划是怎样形成的? / 166
- 端正和开拓选题思路 / 169
- 编辑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在上海宣传系统 1998 年迎春会上的发言 / 174
- 在书评阵地上 / 175
- 众说纷纭话储运 / 177
- 创名牌与保名牌 / 179
- 关于国家图书奖获奖情况的分析 / 181
- 从六届国家图书奖中看出版社 / 193
- 《中国图书业经济分析》序 / 211
- 《WTO 与中国出版》序 / 220

目 录

- 出版社是事业还是企业/ 223
- 中国图书出版业的滞胀现象
——兼论出版改革的症结所在/ 225
- 中国的图书市场/ 243
- “调整”是出版“十一五”的当务之急/ 249

辞 书 研 究

- 积极开创辞书事业的新局面/ 258
- 试论辞书的思想性
——《辞海》(1979年版)编辑体会/ 270
- 辞书特性探索/ 282
- 专科词典释义十法/ 302
- 辞书记失/ 312
- 试论经济范畴、概念的释义/ 342
- 三分编写 七分组织/ 348
- 十年磨一“剑”/ 350
- 中国辞书学会成立大会闭幕词/ 353
- 解决辞书质量问题的十点设想/ 356
- 辞书出版准入制势在必行/ 359
- 净化辞书市场的五大措施
——建议和期望/ 364
- 开创中国辞书奖是中国辞书事业的一个里程碑
——在首届中国辞书奖颁奖大会暨中国辞书学会
第二届年会上的讲话/ 370

目 录

辞 书 评 论

《语言大典》的教训

——中国辞书学会第一届年会开幕词(1993年11月9日)/ 380

刹一刹著书出书中的粗制滥造风

——兼评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 389

“王同亿现象”剖析

——1994年9月15日在中国辞书学会专科词典专业委员会
首届年会上的讲话/ 393

辞书编纂必须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评《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 401

中国辞书界的“三大战役”

——打假批劣纪事及启示/ 410

迟到的书评:析《东西方哲学大辞典》/ 427

在上海史学界庆贺《中国历史大辞典》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431

评《教育大辞典》/ 434

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

——祝贺《中国茶叶大辞典》出版/ 440

谈新词语词典

——《新词语大词典》序/ 445

20世纪中国哲学辞书编纂出版梗概/ 451

《辞海》纪事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是1979年版《辞海》的灵魂/ 458

目 录

《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 466

《辞海》的编纂和修订/ 471

《辞海》1999年版政治经济学稿件终审意见/ 499

夏老与《辞海》/ 503

罗老与《辞海》/ 512

道涵与出版/ 521

治 社 之 本

论治社之本/ 530

加强人民出版社的自我意识

——1990年7月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532

学习韬奋精神 做好出版工作

——1997年12月9日在中国韬奋出版奖颁奖大会上的发言/ 540

再论《辞海》精神/ 544

辞书工作者应有的精神面貌和思想作风/ 553

终审后记

贺圣遂

二版序

为巢峰同志的文集作序,我当然力不胜任。充其量不过讲点粗浅的读后感,供本书的读者参考。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是个大题目。1979年以来这十多年大概只能算是开头。完成这个历史任务恐怕少不了几代人的持续努力。而且需要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从实践上多方试验,从理论上多方探讨。理论问题是根本问题。我们在出版方面的理论准备显然不足,因此加强出版理论的研究自然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加强出版、印刷、发行的科研工作”。这个指示及时地有力地推动了出版理论研究的开展。同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召开了首届出版年会。巢峰同志在会上发表了论文《出版物的特殊性》,并且荣获首届优秀出版论文奖。这以后巢峰同志不断有研究文章发表。可以说,在十多年来出版理论研究逐步展开的进程中,巢峰同志是走在前列的。收入《出版论稿》的大部分文章都有重要的主题。在阅读这些文章有如回顾十多年来我们走过的道路。这本文集,在一定的程度上,成为这一时期出版改革和发展的部分记录。

巢峰同志的文章好读,观点明确,道理清楚,有些地方颇见锋芒。我喜欢这样的文章。由于时间不够,我是断断续续读完本书清样的。掩卷回想,印象比较深的好像有这么几点。

第一,理论性。本书对一些重要问题,有些是有争论或者

二 版 序

有歧义的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理论研究,而且有独到之处。例如,关于图书作为商品的个性和共性的问题。作者对图书作为商品的个性(特殊性)展开了相当充分的分析和论证,对图书作为商品的共性(普遍性)也展开了相当充分的分析和论证。作者在分析论证之后归结为:“指出图书的特殊性,从理论上丝毫不能证明图书是不完全的商品。同样,强调图书是完全的商品,并不否定图书的特殊性,并不否定图书的生产除了应当遵循商品经济规律外,还要遵循精神生产的特殊规律。”我看这样概括是比较全面的。又如,关于图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问题。作者指出,图书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还体现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图书的“社会效益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不以经济效益为转移”。在这里,作者对两个效益在一般商品上的共性和在图书这样商品上的个性进行了具体分析,为出版单位正确处理两个效益的关系提供了依据。图书具有商品的普遍性,又具有同时是精神产品的特殊性,这个基本矛盾,可能是出版经济学的核心。作者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比较深入的理论研究。论者认为,关于共性、个性的道理,是辩证法的“精髓”。看来作者对这个“精髓”的掌握和运用是有点功底的。

第二,实践性。本书的理论研究都从实践经验出发,言之有物、言之有据。同时又有有的放矢,处处着眼于指导和推动实践。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是理论研究的正道。本书这种例子很多,最突出的是长篇的治社之法和辞书研究。写这些大块文章,不仅需要有着相当的理论修养,还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例如,作者提出:“在形形色色的治社之法中,其他都是子法,而提高出版队伍的素质和加强社风建设则是母法。由此可见,见钱不见书的出版者,是劣等的出版者;见书不见人的出版者,是平庸的出版者;而以提高人的素质和加强社风建设为治社之本,以出好书为强社之路的出版者,才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出版者。”这是宝贵的经验之谈,也是以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基础的精辟概括。又如,关于“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作者提出:“我们要努力使《辞海》精神成为社风的核心。”“只有靠优良

二 版 序

的社风,才能出好书,出人才,获双效益。从严治社,严明的纪律、严格的制度、严肃的作风、严谨的态度,一句话,严肃认真,就是《辞海》精神的具体体现。”《辞海》精神,实际上是辞书编纂出版工作应当坚持和发扬的基本精神。作者的这些话,可不是空泛的议论。很多同志知道,作者曾经长期主持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工作和担任《辞海》副主编,有几年他还同时主持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工作。他在这些工作岗位上成绩卓著,有目共睹。他的工作成绩和实践经验,既是形成他的理论的客观基础,又是验证他的理论的客观依据。

第三,前瞻性。本书对一些重要问题发表意见,在时间上是比较早的。它表明了作者对实际生活的敏锐感受和深刻思考。例子之一,关于出版改革。早在1983年作者就提出,要“有一个适应商品经济的健康的社会主义出版体制”;要“摆脱”“剩余价值规律的强制”,“按自身的规律进行生产”。这个“自身的规律”应当就是现在说的“出版规律”。1989年作者提出,要克服“政策导向与机制(经营管理体制)导向背道而驰”的问题。作者指出“利润指标管得住物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却管不住精神产品的思想性”,因而明确表示“反对把工业企业的承包模式生搬硬套到文化事业上来”,主张“针对出版物的特殊性,采取特殊办法,建立以社会效益为主要导向的承包责任制”。这个意见很清楚,抓住了问题的要害。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后,作者在他那篇引起广泛注意的《出版改革的大趋势》一文中,对出版改革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版体制”进行了阐述,说明“出版部门,既要遵循精神劳动、精神产品的规律性,又要遵循商品和市场经济的规律性”。其后,在《出版改革的再思考》一文中,作者进一步阐述了出版改革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又“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出版体制”。1994年以来,中央关于出版改革有了正式的提法,就是要“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和符合出版规律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拿后来中央的提法对照,可以发现作者前后的认识是变化发展、逐渐趋同的;而在当时,作者的看法还是颇有见地的。例子之二,关于

二 版 序

出版社的经营管理。1987年,作者接连写了《出版经营哲学》和《出版经营方法探索》两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相当全面的论述,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价值。作者指出:“从重视出版经营,到否定出版经营,再到全面认识和肯定出版经营,是一次认识过程。”我只想引用其中关于经济核算的某些内容。我对这很有兴趣。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而我们对它的认识还很不够,处理的能力又很欠缺,实在是我们出版社工作的一个薄弱环节。作者指出:“出版经济核算包括资金核算、物资核算、劳动核算、会计核算等。这与任何部门的核算并无区别。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成果,是经济核算的基本原则。”同时指出:“出版物与一般工商品不同,它的价值似乎一会儿是一,一会儿是百,几乎难以捉摸。出版核算,首先就要认清出版物的这一特点。”作者抓住了一个重要问题。出版社由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讲了好多年,有些同志似乎以为这个转变就是增加出版社自办发行,而对出版社的经营管理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从而也没有给以应有的加强。这是很大的误解。时间过去九年了,作者关于加强出版社经营管理的意见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第四,论战性。生活本来就充满矛盾,更何况我们的社会正处于历史性的转型时期。我们非常需要对消极现象的严肃批评。强大的舆论力量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杠杆。对出版界来讲,同样如此。所以,我对本书的几篇批评文章很欣赏。例如,1987年,作者提出警告:“出版物的总体质量已有滑坡趋势,如果任其发展,必将出现严重的后果。”1992年,作者大声疾呼:“刹一刹‘无错不成书’的歪风。”这些都是切中时弊的。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近几年来,作者对辞书编纂出版工作中剽窃抄袭、粗制滥造的严重不正之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义正词严,旗帜鲜明。作者在辞书的编纂出版工作上,既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而作者的批评文章,立论严谨,说理透彻,很有力量。这些文章,不仅对改进辞书的编纂出版工作有直接的意义,而且对整个出版工作的改进也有积极的意义。

我在上面说的这些,有很大的局限性,属于挂一漏万。我想,每一

二 版 序

位读者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对本书的内容,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不论是发挥还是补充,我看都是好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需要广泛的深入的工作研究和理论研究。实践是没有止境的,认识也是没有止境的。我相信,本书的问世对出版工作和出版研究,都会起到有益的推动作用。

巢峰同志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工作非常繁重。他还能挤出时间从事研究、从事写作,表现了一位领导干部的优秀素质。领导工作,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就是做理论结合实际的工作。领导干部自己动手做调查研究、写文件和文章,是分内的事情,甚至是必修课。在这一点上,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也是一个在当前值得重视和发扬的优良传统。领导干部大事小事都依赖秘书代笔,恐怕不是好办法。

本书是巢峰同志对出版事业的又一重要贡献。这是一本文集,今后巢峰同志行政工作的负担逐渐减少,能不能写一本关于出版经济学的专著?《出版物的特殊性》一文的副题明文标出“出版经济学绪论”,可见巢峰同志久有此心。我希望这本酝酿已久的《出版经济学》能够早日完成。它不仅是巢峰同志个人的夙愿,更是我们共同的出版事业的迫切需要。

刘 果

1996年12月11日于北京

出版理论

出版物的特殊性

——出版经济学绪论

世 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各有其特殊性质。图书、报纸、杂志等出版物当然也有它的特殊性质。只有弄清出版物的特殊性,才能确定它与其他事物的区别,弄清出版工作的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和内在规律,才能运用正确的方法,处理和解决出版工作的矛盾,促进出版事业的发展。

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的统一

出版物是随着纸张和印刷术的产生而产生的。但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它的品种或印数都极其有限。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后,出版物像许多产品一样获得了普遍的发展。出版物与一般商品相比,既有区别的一面,又有同一的一面。出版物作为精神产品,是与一般商品相区别的,而作为物质产品,是与一般商品相同一的。

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一般商品,都有一定的物质内容和形式,两者不可分割,是在同一生产过程中完成的;此外,再无其他的内容和形式,再无其他的生产过程。出版物等精神产品则不然,它除了物质内容和形式外,还有思想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以尚未成为物质产品的文艺作品(稿件)而言,通过塑造形象生动地再现在作品中的现实生活,及其所体现的思想感情,是它的内容,而体裁、结构、语言、表现手

法等则是它的表现形式。

出版物的思想内容和形式,一般先于物质生产过程,不是通过体力劳动而是通过脑力劳动来完成的。这一生产过程是精神生产过程。出版物有精神和物质两个生产过程,前一个过程生产产品的思想内容及其表现形式,后一个过程生产产品的物质内容及其表现形式,这是它不同于一般商品生产的特殊性。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物质产品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劳动的产品,或者说,并不妨碍他们的共同劳动的产品体现在物质财富中。”^①出版物就是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经过两个生产过程而共同生产的产品。

与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这两个生产过程相适应,出版物就有编辑出版与复制两个基本生产环节。出版社、报社、杂志社(均不含印刷)等是前一个环节,即出版物的脑力劳动的承担者,担负精神生产的任务;印刷厂等是后一个环节,即出版物的体力劳动的承担者,担负物质生产的任务。

脑力劳动并不是不消耗体力,画家作画,教师教书,作者和编者体验生活、调查研究、翻阅资料等,都要消耗一定的体力,但它与脑力消耗相比是微乎其微的。我们在研究精神产品的性质时,是把这种体力消耗作为脑力消耗的附属物而抽象了。

教育等脑力劳动,一般不凝结为劳动产品,而直接物化在劳动力中。与此不同,从事写作和编辑出版等的脑力劳动,则直接物化在产品中,成为物质生产劳动的组成部分;而在物质产品消费时,才转移到劳动力中去。但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必要条件。

出版物的精神生产过程固然也要笔墨纸张、书籍、仪器等工具,但这些东西与脑力耗费相比,几乎不成比例。所以说,出版物作为精神产品,它的基本生产力就是脑力劳动者,就是知识分子,就是作者和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4页。

辑这两支队伍。

作者和编者的科学知识水平、思想境界、艺术修养和业务能力的
高低,直接决定出版物的质量水平。没有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编创
者,不可能传授先进科学技术;没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不可能
宣传无产阶级世界观;没有相当艺术修养的人,也不可能创造出精湛
的艺术;没有写作和编辑加工能力的人,自然不可能编创出作品来。
这些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说,思想内容及其表现形式是出版物的
灵魂,那么,作者、编者就是灵魂的塑造者,灵魂的工程师。与此同时,
作者、编者的劳动积极性,又直接影响出版物的数量和质量。

像一般物质产品的扩大再生产一样,出版物等精神生产,也可以
用外延和内涵两种方式进行。但在现代化条件下,扩大物质产品生
产,主要着重于增加或改革生产力的物的因素;而出版物等的精神产
品生产,则着重于增加或提高生产力的人的因素。例如扩大作者、编
者队伍,从而增加出版物的品种,是外延扩大再生产;提高作者和编者
的素质和劳动积极性,从而不仅发展出版物的数量,而且更重要的在
于通过改进出版物的思想内容来扩大出版物的效果,是内涵扩大再
生产。加强作者队伍与编者队伍的建设,是发展出版事业的前提条件。

生产力在进入机器时代后,一般物质产品的扩大再生产过程,就
是排斥个体生产劳动的过程。与此相异,从事出版物等的精神生产过
程则是建立在个人劳动的基础上的。此点,恰恰与伴随着隆隆机器声
的工厂工人的集体劳动形成鲜明对照。工厂的产品,一般都是集体劳
动产品。钢铁工人甲,决不会说某吨钢是他个人生产的;纺织工人乙,
也决不会说某尺布是他个人生产的。但作者、编者等脑力劳动者却能
明确辨认自己的劳动产品,即使在一部大辞典中,他也能正确指出某
一条目是他编写的。像一般物质生产必须了解和掌握每部机器性能
一样,精神生产的组织者,也必须了解和掌握每个作者、编者的专业特
长,并使其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与此同时,积极为作者、编者创造条
件,使他们在时间上、物质上、经济上得到充分保证,不断进行知识更
新,从而不断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是维持和扩大精神产品再生产的

关键。

现在,我们再从出版物的思想内容及其表现形式进入它的物质内容和形式。一旦抛开出版物的思想内容和形式,我们的考察对象就失去了特殊产品的标志,还原为一般物质产品。从而,出版物生产中通行的规律,就与物质生产中通行的一般规律没有区别。例如书籍从排字进入印刷,从印刷进入装订等的整个生产过程,与一般商品生产一样,都是劳动者使用生产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的过程。生产三要素缺一不可。

以书刊印刷来说,印刷工人是这一物质产品的基本劳动力,纸张、油墨是出版物的主要劳动对象,印刷机械、厂房设施是出版物的主要劳动资料。它们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对出版物的物质内容和形式起决定作用,无论出版物的思想内容及其表现形式如何美好,如果没有物质内容和形式,就不可能成为出版物;虽有物质内容和形式而不美好,也会大大降低出版物的实际效果。所以说,印刷、造纸、油墨、印刷机械和其他复制器具等工业,是出版物的物质基础。物质基础的状况如何,同样直接影响出版物的数量和质量,加强出版物的物质基础的建设,才能保证出版事业的发展。

总之,出版物的思想内容和形式与物质内容和形式是矛盾的统一体,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从前者说,出版物是精神产品;从后者说,出版物是物质产品。前后两者的统一,表现为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的统一。但出版物的思想内容和形式决定事物的本质,精神产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把出版物称为“精神产品”,是就其本质而言的。

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

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出版物在生产过程结束后,就穿上了商品的外衣进入流通渠道。出版物既然是商品,就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

出版物的使用价值也是一种效用,但这种效用既不具有满足生产

消费需要的功能,也不具有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消费需要的功能。书籍、报刊既不能吃,也不能穿,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却越来越不可缺少。如果说,物质生活的消费资料主要在于满足劳动力的生理需要,那么,也可以说,文化生活的消费资料,主要在于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把出版物等文化产品称之为“精神食粮”,是十分贴切的形象化的说法。当然,这只是就其基本性质而言的,并不排斥出版物还有其他效用,例如某些科学技术工具书,能直接用于生产上的需要。那么,具体地说,出版物究竟具有哪些效用呢?

第一,出版物是传播知识的基本工具。在传播知识的工具中,出版物占有重要地位。学校离开课本,就会给传授知识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仅靠言传身教,不但不可能普及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事业,而且也不可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比在校学生更多的读者,需要掌握基本知识、专业知识或解决学习、科研中的疑难杂症,也必须有适应他们需要的各种出版物,如教科书、辞书等等。

第二,出版物是宣传思想的有力武器。传播知识也是宣传思想,但宣传思想的范围并不局限于科学知识,它还涉及人们的立场、观点、理想、道德、情操等世界观问题。出版物是宣传思想的有力武器,任何阶级、学派、团体、宗教,无不利用这一武器来宣传自己的思想。毛泽东同志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这一新的思想是通过什么形式送来的呢?主要是出版物。

第三,出版物是表现艺术的一种良好形式。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出版物日益成为表现艺术的良好形式。绘画、乐曲、杂技、舞蹈等等,都可以成为出版物。既可供人们学习,也可供人们欣赏,它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四,出版物是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不同理论见解和学术流派,只有用报纸、杂志和图书等出版物作为园地,才能相互交流,相互切磋,相互争鸣,从而,在真理的长河中发展真理,推动科学前进。

第五,出版物是交流信息的重要手段。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政治经济形势瞬息万变的今天,信息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出版物是传